

DOI:10.16482/j.sdwy37-1026.2016-03-012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贾洪伟

(首都师范大学 大学英语部, 北京 100048)

[摘要] 回顾1988年以来符号学翻译研究的成果,指出近30年来符号学翻译研究存在利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翻译文本的“脚注式研究”这一不足,提出转换新的视角,建立与语言符号学并立的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的必要性。在厘定翻译符号学基础上,文章从符号学基础、翻译学基础和翻译与符号学联姻基础三个层面,阐述建立翻译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翻译思想基础及可能吸取的教训,构拟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提出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四大要务:(1)建立与健全翻译符号学和语言符号学紧密相关的资料库;(2)确定研究范围、对象和目标,厘定学科术语,建构学科框架;(3)壮大学科团队,扩大国内外影响力;(4)创建专业刊物,促进进行交流。

[关键词] 翻译;语言符号学;翻译符号学;可能性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献编号]** 1002-2643(2016)03-0090-11

On the Possibilitie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JIA Hong-wei

(Department of College English,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48,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review of semiotranslation studies since 1988 in China, points out that semio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has been limi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semiotic theories and research methods to analyze translated texts, which in nature, is footnote-styled research and has little creativity and originality, and hereby puts forth that we need to shift a new perspective in considering the same issues and to establish a new subject-translation semiotics. Ground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the paper expound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of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terms of semiotics, translation studi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furthermore predicts the possible lessons we can learn from building translation semiotics. Finally, the paper proposes the outline of the newly established subject-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hereby four immediate tasks we need do: I. Establish a documentation center for translation semiotics, and even linguistic semiotics at large; II. Identify its scope, object and goal, define the terms concerned, and build a reference framework; III. Strengthen our research to gain more international impact; and finally, establish professional journals to promote the communication among the researchers.

Key words: translation; linguistic semiotics; translation semiotics; possibilities

收稿日期: 2015-03-07

作者简介: 贾洪伟(1977-),男,汉族,黑龙江哈尔滨人,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符号学、语言学典籍汉译史、社会语言学等。

1.0 引言

广义上讲,人类日常生活中接触到,且用以传达意义的任何实物和标记均属符号,这样的符号伴随人类的出现而存在,无处不在、无所不包,但在狭义上,人类发明并用来传达意义和日常讯息的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均属此类,其中语言文字为狭义符号家族的典型成员,也是语言符号学的重点关注范畴,因而语言符号学与翻译关注的符号转换问题紧密相关,研究语言符号学很难绕过不同时期、文化区域和地域之间的表意符号互动这一现象,即同一语言符号范畴内不同时期之间的转换,以及不同语言符号同一时期或不同时期之间的转换,翻译学者称为(狭义)翻译^①,符号学者称为语言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广义来说,翻译中的符号转换应当包括有形符号转换为无形符号(文本阅读后的思考与思辨)、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如前狭义翻译)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由构思形成文字)。^①

不论中外,符号学和翻译研究均有悠久的历史且均以经典文本为讨论对象,古希腊和先秦诸贤均有过语言符号的专论或零星的阐述,古罗马和先秦之后的学者探讨过有关翻译的论述,但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却始于近现代。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 - 1913)将语言符号的指称分为能指(signifier)和所指(signified),奠定了结构语言学阵营的语言符号观;美国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 Peirce, 1834 - 1914)从哲学角度探讨符号代表项(representation)、对象(objec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要素,构建了“符号的三合一分类法”,其核心类别有三:象似符(icon)、指示符(index)和象征符(symbol),从而提出一级符号(firstness)、二级符号(secondness)和三级符号(thirdness)的符号三元观^②;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Charles William Morris, 1901 - 1979)认为符号不仅包括言语符号,还包括非语言符号,任何符号都由载体(vehicle)、所指(referent)和解释项(interpretant)三部分构成,进而形成符号表意的形式意义(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意义)、存在意义(符号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意义)和实用意义(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关系意义),用于意义研究就分别形成内在意义(符号之间的体现意义)、指称意义(符号与所指之间的体现意义)和语用意义(符号与解释项之间的体现意义),从语言符号关系角度形成日后语言学的句法学或语形学(符号与符号之间的关系)、语义学(符号与所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和语用学(符号与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三个部门,等等。这些主要的符号学理论促进了符号学的大发展,并建立了符号学学科,推动了符号学理论在文学、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应用和发展,现以翻译为切入点,简单地介绍符号学与翻译联姻在国内外的的发展状况。

受皮尔士符号三元观启发,美国符号学家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 1896 - 1982)以诗学文本为切入点,从符号学角度将翻译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三类^③;美国结构语言学家奈达(Eugene A. Nida, 1914 - 2011)借用索绪尔和莫里斯的符号学观点,写作《翻译科学探索》(*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1964),奠定了用指号过程(semiosis)探讨翻译问题的社会符号学传统;格雷(Dinda L. Gorlée)写作《符号学与翻译问题——关于皮尔士的符号学》(*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 1994)^④,以皮尔士符号学观为基础探讨符号转换现象,此后逐渐将有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延至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及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范畴,引发国际学界对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关注。

在中国,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研究相对较晚。《中国翻译》1988年第1期刊载罗进德“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柯平“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张亚非“符号结构 文化差异 语际翻译”、郑伟波“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4篇文章,张泽乾于同年在《语言与翻译》刊发的“翻译断想”,以及李锡胤于《中国翻译》1989年第3期刊布的“关于文学翻译的思考”,这6

篇文章拉开了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大幕。截止 2014 年 4 月末,据“读秀知识库”以“符号学翻译”为全部字段搜索条件,共获得相关期刊论文数据 142 项,学位论文 99 篇,包括博士论文 4 篇^⑤、硕士论文 95 篇,另有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 2 部;另据“中国期刊网”(CNKI Scholar)同一主题搜索条件,共获得相关数据 200 篇(实际上,远不止这个数目)^⑤,其中博士论文 10 篇、硕士论文 71 篇。从数据分布看,2007 年前期刊论文占论文发表总量的三分之二,2007 年后共有论文 49 篇,学位论文始于 1996 年(一篇未上网博士论文,2 篇硕士论文);以期刊论文增长转折点为据,至 2007 年共有 27 篇,每年近 5 篇,2007 年后有 54 篇,每年近 8 篇,说明国内符号学翻译研究在不断发展和深入。

就研究内容看,1988 年以来,符号学与翻译的联姻研究大致呈现以下几方面的特征和趋势:(1)用符号学理论分析和解释文学翻译现象和翻译过程,如“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蒋骁华,1996、2003)、“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刘静,2005)、“文学乌托邦的符号翻译”(胡牧,2013)、“文学翻译的符号学特征”(吕俊,1994)等;(2)社会符号学翻译的理性思考、渊源及应用研究,如“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陈宏薇,1996)、“社会符号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李明,1997)、“社会·意义·功能——社会符号翻译法的核心”(何家驹,1999)、“语际翻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李明,2004)、“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语电影片名翻译”(路景菊,2007)等;(3)符号学与翻译联姻各层面的本体理论探索,如“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隋然,1994)、“符号学与翻译学”(尹城,2002)、“略论符号学的翻译对等观”(徐岚,2007)、“翻译的符号学单位”(王治江等,2007)、“论语言符号学的翻译单位”(孙瑶,2011)等;(4)以符号学或社会符号学理论探索隐喻、习语、数词非指称性、文化负载词等的研究,如“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衡孝军,2003)等;(5)符号学或社会符号学应用于少数民族典籍的翻译研究,如“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策略”(吕爱军,2013)等;(6)中国符号学翻译的综合宏观考察,如“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综述”(王丽娟,2013)等。可见,符号学翻译研究已触及学科联姻的理论探索、文学译作分析和阶段,以及非文学文本的应用研究,如商标、电影、产品说明书、外宣文本、旅游文本、影视、服饰等。

纵观近 30 年的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成果:(1)社会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应用研究,远胜于符号学与翻译的理论探索和应用研究;(2)运用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理论^⑥研究文学翻译的作品比例较大,其中尤以诗歌、《红楼梦》等文学文本解析、品评的居多,王丽娟(2013)认为该类文章占发表总数的 46%,现实中文学类别的研究总量只多不少;(3)就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创新度而言,该期成果或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翻译现象和过程,或补充说明翻译理论,仍处于“脚注式”符号学翻译理论阶段,还只停留在传统研究视角下以翻译文本、翻译阐释过程的层面,没有关注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过程,尚未涉及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跨学科理论和方法论的构建层面。之所以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会停滞于“脚注”类型的分析和解析类应用阶段,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没能找到学科立足点,没有一个全新的学科方法论为指导原则。

符号学翻译研究这一称谓的语义内涵及语义焦点透露出的是:以符号学理论和方法,探讨翻译理论和现象,本身就是符号学的一种附庸,在本质上是符号学理论的一种阐释研究,不论在符号学还是在翻译学之中,符号学翻译研究都属于非典型范畴,仍处于极其边缘的地位。换言之,不论是翻译符号学,还是符号学翻译研究,落脚点不同,学科归属也就不同。(王铭玉,

2004、2013)如此一来,不如换一个视角,借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⑥,以翻译中的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重新创建具有自治性的符号学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

本文拟将翻译符号学纳入符号学范畴,将其视为与语言符号学并立的一个重要的符号学分支学科,以翻译发生过程中涉及的符号转换现象为切入点,既包括言语符号转换成言语符号(同语言内部符号之间的言语转换,同雅可布森的语内翻译范畴;不同语言类型之间的言语转换,同雅可布森的语际翻译范畴),也包括言语符号转换成非言语符号、非言语符号转换成言语符号及非言语符号转换成他类非言语符号,旨在论证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

2.0 何谓翻译符号学?

如上述,符号学翻译是借用索绪尔的语言符号能指与所指理论、皮尔士语言符号三元观、莫里斯的语形、语义和语用三分法等,分析和解释翻译理论难以应对,或翻译理论自身不能充分地分析和解释的翻译现象和过程,其本身仍属以翻译语料和翻译过程为对象的符号学阐释研究,并非是翻译研究,因而不免徘徊于符号学和翻译学的边缘。相反,翻译符号学以翻译过程中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从而区别于以翻译为研究对象的翻译学,翻译符号学同语言符号学不为语言服务一样,不以为服务翻译为宗旨,其目标是以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为指导原则,构建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

鉴于符号存在的精神,即是为人类社会交际提供传情达意、转载信息的手段,且符号转换又属跨介质的信息传递,翻译符号学乃是注重于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其终极目标是以翻译中涉及的符号转换为对象,构建以符号转换为研究对象的特有符号学理论体系。

翻译符号学不同于符号学翻译,主要体现在(1)虽然翻译符号学与符号学翻译均以翻译为对象,但翻译符号学是以翻译中涉及的符号转换为对象,构建以符号转换为对象的符号学分支学科体系,而不似符号学翻译使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翻译现象,说明符号转换的过程,补充翻译研究的不足,后者在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的应用研究,或翻译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层面;(2)翻译符号学不似符号学翻译那样,止步于理论配素材的语料脚注式分析,而是从符号转换中加以归纳,提炼出具有普遍性的理论和方法,上升到学科方法论的哲学高度;(3)翻译符号学是针对翻译的宏观理论,具有阐释符号转换规律、总结符号转换特点、指导实践的作用,而符号学翻译是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应用的微观操作,两者是宏观与微观的关系;(4)两者关注的范畴虽然都是翻译,但翻译符号学以符号转换为对象,不但涉及有形符号转换成有形符号,还关注有形符号转换成无形符号和无形符号转换成有形符号,其性质属于学理层面的符号学理论研究,而符号学翻译以翻译文本和过程为对象,阐释有形文本符号转换的过程、规律等,尚处于符号学的脚注式阐释研究或曰应用研究,未关注无形符号与有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范畴,可见两者的研究路向和终极目标有所不同。

翻译符号学关涉符号学和翻译两大研究领域,前者涉及与有形符号转换密切相关的符号学分支学科——语言符号学。由于翻译符号学系符号学与翻译研究的联姻,势必关涉符号学、翻译研究及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跨学科研究基础,这决定着(1)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研究的前期基础是否充分;(2)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学科知识基础是否充分;(3)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合理性和可操作性。

3.0 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基础

如前述,欲建立翻译符号学,可能性基础有符号学、翻译研究和翻译与符号学联姻三方面,

现以国内近年的研究成果加以一一论证。

3.1 符号学基础

语言符号的探索大多与语词表意及语词在表意过程中的作用和功能相关。从这一角度讲,不论中外,语言符号研究自古有之。古希腊学者围绕语言符号问题有过众多争论与阐述,其中集大成者为柏拉图(Plato, A. D. 427 - A. D. 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 A. D. 384 - A. D. 322),前者在《克拉底鲁篇》中讨论事物与名称之间的关系问题,即名称是由事物本质决定还是约定俗成;后者在《诗学》和《修辞学》中提出有意义符号和无意义符号的主张,又在《工具论》中深入地讨论语言符号问题,即《范畴篇》提出语词范畴问题和同音异义词、同义词、引申词问题,《解释篇》讨论名词、动词、句子定义及命题之间的语义关系问题。(肖峰,1989:13)此后,历代哲学名家均探讨过语言符号问题,其中著名者为培根、洛克、霍布斯、贝克莱、布莱尼茨、索绪尔、皮尔士、卡尔纳普、莫里斯、雅可布森、巴特、艾柯、奈达、巴赫金、洛特曼、格雷等。

中国早在周秦时期,便有学者研究语言符号,到两汉时期达到繁盛,诞生了《说文解字》这一语言符号的集大成作品。针对语词表意问题,先秦诸子及其后先贤也发生过名实之争,落脚点无非是名实之间的关系是规定的还是约定俗成的,其中的代表为孔子的“正名”、荀子的“约定俗成”等^⑦,虽然古代先贤均或多或少探讨过语言符号问题,但尚未上升到系统化、层次化、理论化的现代学科高度。从现代“学”的角度对语言符号加以系统化的研究和学科体系构建,则始于王铭玉的《语言符号学》(2004)和《现代语言符号学》(2013)。

诚然,语言符号学研究的是语言符号的表意相关问题,但目前的语言符号学对语言内部各时期变体之间和语言与语言之间的表意问题(即翻译问题)涉及较少,可至少为语言文字之间(语内与语际)和非语言文字之间(符际或语言与非语言符号)的信息转换提供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就发生机制而言,翻译符号学的学理基础在很大程度上是符号学,且与符号转换相关的内容占重要地位。鉴于翻译符号学为符号学的分支学科,且与语言符号学在有形符号间转换

层面具有重要的交叉,兹以国内相关主题的著作——《语言符号学》(2004)和《现代语言符号学》(2013)为例,简单地陈述语言符号学研究的进展,探讨支撑翻译符号学建构的理论基础。

从内容讲,《语言符号学》(2004)分三部分,第一部分从符号发生到成为系统化、结构化、层次化和理论化学科角度,探讨了人与符号、语言与符号、语言学与符号学之间的关联,从纵的层面沟通古今先贤的语言符号思想(索绪尔、皮尔士、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可布森、巴赫金和巴特),构成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基础;第二部分从二元对立、符号层次、符号意义、符号指称、符号关系、符号时态与功能、符号主体观、符号双喻观(隐喻和换喻)、符号可逆性、符号象似性、符号标记性等角度,从横的层面联系中外诸家语言符号理论,探讨语言符号的基本属性和功用问题,用以分析转喻、隐喻等传达信息的语言承载介质现象;第三部分以美国、法国、俄罗斯三国为例,梳理符号学理论发展的国别历时状况,总结 20 年来(1984 - 2004)中国符号学研究的主要研究方向及其成果和阶段性特征,预示未来的发展状况。其中,意义与指称、组合关系与聚合关系、符号学相关的功能学说、语义主体论、象似性、符号标记与文化认知心理观等均是翻

译符号学的重要理论。譬如,格雷(Gorlée,2010)以歌剧为例,阐发言语符号(剧本、乐谱)转换为言语符号(舞台唱词和对白)和非言语符号(配乐、体势语、布景、服饰、妆容等)的指号过程,就涉及符号文本的功能与符号呈现、文化源符号指称(意大利歌剧)与意义呈现(西班牙唱腔)、导演与歌唱演员个性化呈现(符号对象与解释项之间关系的主体间性)、文化认知与呈现心理等问题。

《现代语言符号学》(2013)沿着符号→符号学→语言符号学→思想渊源脉络,构建现代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基础和发展脉络,从宏观层面汇通全球语言符号研究的思想,探讨语言符号的哲学方法论基础,从微观层面应用语言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分析词语层、句层和篇章层的语言符号传达语义信息的规律,虽然没有明言传达语义信息的符号转换问题,在实质上却已考虑到并包含了类型的内容,如皮尔士三位一体观、符码发生观、符号互文性、语义层级、篇章连贯等均频繁出现于国外翻译研究的著述,用以探讨歌剧符际翻译中的跨学科问题(Gorlée, 1997a)、歌剧翻译中的唱词与音乐配置问题(Gorlée, 1997b)、翻译行为的本质问题(Robinson, 2011)等。

二著的共同点在于系统梳理语言符号学理论基础,凸显其新兴交叉学科的本质,以图为“研究语言符号本身以及用符号学的思想和观点来研究语言问题”。(王铭玉, 2004: 90)翻译关涉的符号转换问题,既属于符号载义问题,如载体、所指、解释项及形式意义、存在意义和实用意义,又属符号转换中涉及的指号间性问题,其中有关言语符号转换的内容就必然要由语言符号学的理论加以宏观指导,从而语言符号学构成了言语符号转换部分的宏观理论基础。即便是对非言语符号之间的转换问题,语言符号学也可以提供一定的参考。

皮尔士将指号过程视为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的三元关系,后来衍生为媒介关联物、对象关联物和解释关联物。符号具有产生解释项的能力,符号及其指称的逻辑对应关系,只有经过解释才具有社会意义,因符号及其指称意义具有动态性,解释符号的过程也就无穷尽,可一旦解释终止,符号的生命随即宣告完结,如七八十年代指称舶来商品的洋火、洋布、洋油、洋伞等,现如今就已经成了濒临死亡的符号。

作为指号间性行为 and 过程的翻译,关涉作者、原文本、源语言符号系统、源语言文化生态及意识形态、译者、目的符号系统、目的文化生态系统及意识形态等之间的对应与合成关系、是译者作为符号主体对即有符号文本的意义解释,经另一门符号相关的语言文化符号系统的重新构建,呈现于目的社会生态系统,为目的读者传递文化信息,供其继续解释。可见,符号学建构的方法论基础及其理论观点,在指导翻译符号学研究中的作用。

3.2 翻译学基础

自符号创生之日,人类就使用符号传达信息,记录活动事件,积累文化结晶。随着种族之间的互动和思想的融通,符号成为各族之间沟通信息的有利媒介,符号之间的转换因文化信息传达之需而产生。符号转换的过程无非是从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既包括同类符号系统,又包括不同系统之间的信息传达,其中不免涉及译者采用的隐形中介语;符号转换的前提是通晓两种文化的行为主体,主体间性(作者与译者之间存在的相关性区别)决定着符号转换成果的性质和忠信度,遂而产生原、译文本之间的差异。有关承载信息符号的转换本质和过程的研究被称为翻译研究,从宗教文本的忠实呈现到结构语言学、描写语言学、形式语言学、功能语言学和语篇语言学为主导时期的语言学翻译研究(其中包括结构语言学主导的符号学翻译研究),再到文学译介为主导的译介学和文化转向后的文化翻译研究,如今进入后殖民、生态、文化、变译等共生共存的百花齐放的争鸣时期,但在翻译研究的方法论建构层面以及跨学科的多样性研究仍略显薄弱,特别是从语言符号学视角研究有形符号间转换和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间转换的成果仍十分稀少,特别不利于翻译学理论的学科建设。

有关符号信息转换的理性思考可追述至千年以前,其中与语言符号相关的翻译观点也十分丰富,如“三不翻”“五不易”等。早在1959年,符号学家雅可布森就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中阐发了语内、语际和符际翻译思想和类分观点。在《语

言中的欲望:文艺研究的符号学路径》(*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1969)中,保加利亚籍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从文学文本信息组织角度,提出文本信息存在类似马赛克组织的质地特征,这种特征主要存在于文学文本,被称之为“互文性”(intertextuality)^⑧,即读者识别横向排列文本间相互关系的一个因素。罗选民完成博士论文“互文性翻译研究”(2006),秦文华出版基于博士论文的专著《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2006)^⑨;奈达于 1970 年代提出的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李明以此为理论根据完成博士论文“语际翻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2004),等等。

这些与符号学相关的信息组织和传递方式均为翻译符号学建设增添了新鲜血液。有形符号是符号学的核心成员,其中尤以关涉有形符号转换的言语符号为典型范畴,传统翻译研究又以语言符号的转换为基本对象,因此传统翻译研究的成果,特别是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翻译研究成果,可构成翻译符号学建设的思想基础。

3.3 翻译与符号学的联姻

翻译与符号联姻可追溯到佛经翻译的经验之言,但翻译与符号学的联姻是近代的事,国内学者袭用国外符号学与翻译联姻的分析范式,分析文学译作、商标、旅游等文本,如前文所举诸例。尽管在 20 余年的探索中刊发了 200 余篇期刊论文,出版专著 2 部,完成硕博论文 200 余篇,大多囿于运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翻译素材,本质上属于符号学理论在翻译领域的“脚注式”分析,其中浅尝辄止者多,大多略显感性化,系统化程度较低,不能从学科哲学高度看问题。尽管如此,这些成果构成了翻译符号学前科学阶段的理论探索式尝试,可为建立翻译符号学提供有益的经验教训。

从符号学角度讲,翻译是复杂的传递信息指号行为和过程,是符号主体针对原文本信息,采用另一种符号系统地解构文本信息,建构另一全新符号文本,其中关涉符号一所指之间的动态阐释关系,供译者阐释文本意义。原文本中的符号与所指之间呈固定的可能意义逻辑关系,翻译代表的是相对自由的意义潜势阐释,因而原文本构成了该阐释的出发点,沿着解码—编码—重新编码这一动态的线性过程,以源语为工具获取信息(解码),在头脑中组织原文本的信息结构(编码),在全面考虑到符号本体层面的指称、意义构建和文本组织,以及符号本体外部层面的语用文化信息基础上,以目的符号形式构建文本(重新编码),呈献给读者品读(重新解码)。

文本符号的转换包括一级符号、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三大范畴,每一级符号总是由能指和所指构成,两者之间的统一体作为上一级符号的能指进入新符号的构建过程。一级符号通过直觉或感觉表现可能性的性质,系译者对原文本的最初印象和感知,属于翻译行为和过程中的解码初始阶段;二级符号通过经验或活动表现现实性的指称对象,系译者解码和编码活动中的文本意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对应关系建构阶段;三级符号通过思维或符号呈现文本意义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必然对应关系的整合阶段,用以创生全新的符号文本。符号文本的转换历经三级符号退化到二级符号和一级符号,再回归二级符号和三级符号的过程,融入了原作者、译者和读者的个性化因素以及社会文化语用因素,从而成功地创造了一部鲜活的异质性元创作文本,印证了巴特主张的“作者之死”的宏论。

从符号学层面考察符号的转换过程,表面上看是涉及原文本与译文本、作者与译者、组合与聚合、言语与语言、言语符号与非言语符号、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等的二元对立关系,但因翻译过程中要经过译者的解码、编码和重新编码的过程,不免融入位列第三位的中介成分,原文

本经译者阐述,头脑中必然出现隐形的原文本2、译者2、中介语的组合与聚合及中介语的有形与无形符号等因素。

通过审视当前翻译研究的走向,我们发现皮尔士的符号学思想促进了译者的“华丽转身”,翻译早已离开固定的符号——所指间的固定逻辑关系,不再以文本中心论为翻译行为的操守规范,已经从僵化的符号——所指这一“死物”中走向皮尔士孕育的解释项这一无意识的本能阐释路径,这也完全符合翻译行为的主体间性、指号间性和文本间性理论。解释项代表的是符号——所指意义关系的多重阐释,在文化、伦理、政治的多重文化翻译环境中,创作出许多异化的鲜活言语表达符号,将贯穿古今中外的信息组织成译作这一元创作的互文体系。

之所以翻译不拘泥于文本中心论的“乌托邦式”理想,是因为符号转换中的绝对意义同一或等值是难以实现的,不但受到文化传统和类型的制约,更受主体间性、指号间性和文本间性的影响,因而指示项——符号的对应关系,在某种程度上是译者阐释的结果,同时也是译者基于自我阐释做出的推理。因而,翻译符号学不同于传统译论在于:翻译符号学强调翻译过程中的指称本性及指称意义等值的不确定性(蒯因语)和不稳定性。

在完善和建立翻译符号学过程中,我们可充分吸收符号学翻译成果中的有益尝试模式和成果,吸取符号学翻译的经验和教训,将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与翻译研究的思想基础融于一体,以便建立符合现代学科逻辑的具体符号学理论体系。

4.0 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

翻译符号学是符号学的分支学科,系符号学与翻译学交叉的跨学科门类。为扩大符号学的理论影响力,凸显符号学的方法论威力,有必要从学科建构的宏观视角出发,勾勒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以图征求大方之家的批评和指正,以便完善翻译符号学的系统构建工作。

本文拟构的翻译符号学理论框架分为四个层面:(1)探讨符号学和翻译发生的本质,论证翻译符号学建立的可能性,梳理国内外与翻译符号学相关的理论传统、主要观点、成果及研究现状,为建立翻译符号学提供学科知识基础,此为翻译符号学绪论部分的写作任务;(2)鉴于翻译符号学系符号学和翻译研究领域的新事物,有必要建构翻译符号学的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本体论决定认识论,本体论和认识论决定着方法论的确立,本体论涵盖符号学本体论和翻译符号学本体论,以类比形式建构翻译符号学本体论的哲学观、研究目标与范围及三位一体符号转换的本质,认识论涵盖符号学本体论和翻译符号学本体论,以类比形式建构翻译符号学认识论的哲学观、理论基础和理论内涵,方法论以符号学方法论类比翻译符号学方法论,建构翻译符号学方法论的哲学观、理论态度、方法论原则,以及翻译符号学方法的多元性与统一性、翻译符号学研究的出发点、符号转换的基础与方向,此为翻译符号学的宏观理论探索部分,旨在为翻译符号学的微观探索性理论应用提供知识基础和理论支撑;(3)从翻译发生过程的符号转换机制和本质出发,以当前流行且国内涉足不多或研究不系统的文学文本和非文学典籍文本为例,前者含小说(如莫言小说《坚硬的稀粥》、《一地鸡毛》)、散文和诗歌翻译,后者含《易经》、《老子》、马克思主义文献、歌剧、戏曲等,以外语为母语者的译文为范,探讨语言符号学理论的应用和作用,凸显翻译用于信息跨介质传输的元创作本质和过程;(4)以统括全书的视角,回顾翻译史中涉及符号学的理论精神与作用(翻译符号学的精神与作用),从符号学角度重新梳理翻译史的发端与走向^①,预见翻译符号学的未来走向、发展及其中国翻译本土化的发展动向与特色。

如上述,翻译符号学的四个层面中除了绪论,其他三个层面分别为上编、中编和下编,绪论为总体框架提供术语和相关基础知识,上编为宏观理论的建构,旨在为中编的微观分析和考察

及下编的宏观概括服务,总体上沿着宏观——微观——宏观的脉络构建这一新兴学科框架。

5.0 翻译符号学的当前要务

欲建立翻译符号学,当务之急有四大要务:(1)搜罗和翻译各国各语种写作的翻译与符号学相关著述,建立和健全符号学各分支资料库,择一所院校或几所院校在现有基础上建立符号学资料中心;(2)整理和吸收各家之长,在语言符号学基础上,确定翻译符号学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厘定学科术语,建构翻译符号学理论框架;(3)壮大翻译符号学,乃至符号学研究团队,吸收国外符号学相关领域研究学者,扩大国内外学术影响力;(4)建立和建设符号学专业会刊,或择选国内外专业度较高、权威性强的期刊,开辟专栏发表符号学各分支学科的研究成果,促进国内外相关领域学者的交流,为翻译符号学的建立与发展保驾护航。

另外,翻译符号学如同其他学科建立的过程一样,需要有一群志同道合的学者,互相支持与鼓励,克服各种困难,坚持长期作战,如同迎接新生命一般,取得最终的胜利。

注释:

① 实际上,更全面的说法是:同一语言范畴内不同时期内的有形符号转换,不同语言范畴之间有形符号的转换,此二者均为有形符号转换。此外,尚有有形符号转变为无形符号和有形符号,有关这两种类型的转换,详见拙文“翻译符号学的概念”(外语教学,2016 年第 1 期)。此外,有关有形符号、无形符号之间的转换关系及翻译界定问题,亦见该文。

② 一级符号为自我独立的存在,皮氏称之为“感觉状态(qualities of impression)”;二级符号为个别时间和空间上的经验,涉及主体与被感知事物间的关系;三级符号属于中介、习惯、记忆、再现、交流等抽象范畴,使得具体时空经验获得新形态。(贾洪伟,2005:14-15)

③ 在《翻译的语言学问题》(*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1959)中,雅可布森认为语言符号的了解应依翻译而定,以皮氏符号的三元观为据,将翻译视为皮氏“真正符号活动(genuine sign-activity)”与“退化符号活动(degenerate sign-activity)”的另一种阐述形式(Gorlée, 1994:157),因而提出语内翻译(intralingual translation or rewording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other signs of the same language)、语际翻译(interlingual translation or translation proper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some other language)和符际翻译(intersemiotic translation or transmutation is an interpretation of verbal signs by means of signs of nonverbal sign systems)。(Jakobson, 1959:233)针对雅氏的这一划分方法,黄忠廉(2014:17)认为雅可布森的三分法是标准混杂、错层并列,进而指出:“若按符号分,有符内翻译和符际翻译;符号若为语言,则可再分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实际上,黄氏的再分法依然存在类似问题,语言本就是符号的核心成员,无须假设。若从广义符号来界定翻译的划分方法,首先应将符号分为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或曰言语符号和非言语符号),语言符号再分为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非语言符号则再分为同类符号系统内部转换(如以红、黄、绿与方块的加减来表达交通通行信号)和符际转换。此外,雅可布森的三类翻译模式界定极其勉强,他尚未关注 20 世纪后半叶的反向翻译或逆向翻译。如今步入 21 世纪,随着艺术家对新表达方式的追求,跨媒介和多媒介艺术实验已经司空见惯。在雅可布森的原始界定中,非语言符号翻译为语言文本符号,以及将非言语符号翻译为同一语言或其他语言的言语符号,均缺失或有所遗漏。参见 Gorlée(2010)此外,雅氏侧重的是写书符号及兼顾音韵的物理无形符号,还未关注有形符号转换到无形符号和无形符号转换为有形符号的系统建构问题。

④ 该书的理论出发点为皮尔士的著名主张:一个符号的意义在于将其译成另一个对等的或更加发达的符号,进而格雷论述了符号学翻译研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格雷的贡献在于提醒学界:(1)将指号过程当作符号翻译范式的逻辑含义;(2)翻译体现在指号过程中。就本质而言,格雷(1994)仍属于符号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皮尔士符号学在文本中的阐述,只是从符号学视角探讨翻译现象,旨在证明翻译可以同化为指号过程(参见蒋晓华 2003:21-22),尚未构建翻译研究特有的符号学理论,仍处于工具论的实用阶段。此外,格雷修正

了索绪尔受规则约束的符号概念,摒弃语言符号的静态研究,推举皮尔士的动态指号过程理论,对比维特根斯坦的符号观与皮尔士符号观,将维氏符号概念转化为皮氏符号学框架,有效地完善了皮尔士符号学应用于翻译研究的理论和方法,却陷入了皮氏指号线性推理的误区,忽视了翻译现象所有的动态言语间性特征,详见 Dan (1996:56-57)。格雷的最大贡献在于系统地关注有形符号与无形符号的问题,但未做出条分缕析的归纳。

⑤ 4篇博士论文分布在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黑龙江大学和南开大学,从硕博论文的总体分布看,上海外国语大学有博士论文1篇,硕士论文3篇,是国内符号学翻译学位论文成果较多的院校。此外,还有北大蒋晓华的博士论文“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1996)。另,王丽娟(2013)以全文关键词“符号学翻译”在中国期刊网进行搜索,截止2013年1月1日共获得293项数据,笔者于2014年4月29日以同一条件在读秀知识库搜索,获得142项相关数据,又在中国期刊网以同一条件加以重新搜索,共获得200项相关数据,本文暂以中国期刊网所得数据为前期分析数据。

⑥ 所谓社会符号学系普通符号学、语言学与社会学理论融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其研究对象至今并未得到学界公认,研究范围也不甚明确。有关社会学翻译观系美国已故翻译研究者奈达于1980年代的翻译理论创见,主张不管是语言符号还是非语言符号(体态语、超语言行为或副语言行为)均具有社会意义,从翻译角度讲,翻译传达的就是这种跨语言、跨符号、跨社会文化的意义(翻译即意义),故以美国符号学家莫里斯的符号观(详见正文)为翻译意义的理论基础,就其本质而言,仍属普通符号学范畴下未被认可的一门学科。此外,语言符号学采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语言问题,翻译符号学采用符号学理论和方法论研究符号转换问题,两者均属符号学的分支并列学科。

⑦ 这些观点均针对社会语言使用不规范,特别是语词指称混乱而提出的,欲采用“下传上达”方式向朝廷提交有关语言规划的政策思想,以便朝廷施行语言规划的政策,相关思想参见“秦以前语言政策思想举隅”(待发)。

⑧ 这一理论经克里斯蒂娃提出,得到巴特(Barthes)、蓝克(Lemke)等人的认同和发展,目前主要有如下三类定义:(1)后结构主义和结构主义者认为,每个文本的外部形式都是由马赛克似的引语片段的拼积、镶嵌而成,每个文本形式都是另一文本的吸收和转换(The poststructural or deconstructional view: Every text is constructed as an intertextual mosaic of citation; every text is an intertextual absorp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ther texts. 参见 Kristeva, 1969:146);(2)历时和横向结构主义者认为,互文性被视为不同文本形式间的关系(文本外部关系),各文本之间互相参考、借鉴并融文化内涵和知识结构之中(Diachronical and paradigmatic view: intertextuality is seen as 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distinct texts — extratextuality where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knowledge structures are incorporated into intertextual references. 参见 Barthes, 1970);(3)共时和纵向结构主义者认为,互文性被视为文本内各因素之间的文本关系(文本内部关系)(Synchronical and syntagmatic view: intertextuality is seen as textu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ments within a text-intratextuality. 参见 Lemke, 1985)。

⑨ 有关二者的书评,参见笔者新浪博客:http://blog.sina.com.cn/s/blog_435ee4880100xq75.html, 2014-12-9。

⑩ 从符号学角度看,特别是语言文字符号转化为非语言文字符号的角度,新疆库车地区的艺术符号学考古发现,早在公元前300左右,佛教就根据佛经和现实僧人形象,构建相关的佛教壁画,从广义的翻译界定来看,中国翻译史可前推至公元前300元左右,这于中国翻译史来说是一大贡献。另外,依据言语符号转换为非言语符号、非言语符号转换为非言语不同类型符号的翻译界定,中国翻译史必然要经历范围和广度的更新和变异。

参考文献

- [1] Barthes, R. S/Z[M]. London: Cape, 1970.
- [2] Dan, S. Book Review for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J], *Babel*, 1996, (1):53-57.
- [3] Goriée, D. L. *Semiotics and the Problem of Translation;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The Semiotics of Charles S. Peirce*[M]. Amsterdam-Atlanta: GA., 1994.
- [4] Goriée, D. L. Book Review: *Die Oper als Textgestalt: Perspektiven einer interdisziplinären Übersetzungswissenschaft*

- (1995)[J]. *Target*, 1997a, 9(2): 377-381.
- [5] Goriée, D. L. Intercode Translation; Words and Music in Opera[J]. *Target*, 1997b, 9(2): 235-270.
- [6] Goriée, D. L. Metacreations[J]. *Applied Semiotics*, 2010, (9): 54-67.
- [7] Jakobson, R.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A]. In A. Fang et al. (eds.). *On Translation*[C].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9: 232-239.
- [8] Kristeva, I.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M]. Oxford: Blackwell, 1969.
- [9] Lemke, J. Ideology, Intertextuality, and the Notion of Register[A]. In J. Bensen et al. (eds.). *Systematic Perspective on Discourse*[C]. New Jersey: Ablex, 1985.
- [10] Robinson, D. *Translation and the Problem of Sway*[M]. Amsterdam: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 2011.
- [11] 陈宏薇. 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研究[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6, (3): 93-98.
- [12] 何家驹. 社会·意义·功能——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的核心[J]. 嘉应大学学报, 1999, (2): 74-76.
- [13] 衡孝军. 从社会符号学翻译法看汉语成语英译过程中的功能对等[J]. 中国翻译, 2003, (4): 23-25.
- [14] 胡牧. 文学乌托邦的符号翻译[J]. 江苏社会科学, 2013, (6): 156-161.
- [15] 黄忠廉. 翻译批评体系符号学考量[J]. 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 2014, (2): 17-24.
- [16] 贾洪伟. 从符号学的语义学看文化翻译之文学语言[D]. 黑龙江大学硕士论文, 2005.
- [17] 贾洪伟. 翻译符号学的概念[J]. 外语教学, 2016, (1): 94-97.
- [18] 蒋晓华. 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D]. 北京大学博士论文, 1996.
- [19] 蒋晓华. 符号学翻译研究——文学语言的理据及其再造[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3.
- [20] 柯平. 文化差异和语义的非对应[J]. 中国翻译, 1988, (1): 9-15.
- [21] 李明. 社会符号学的历史渊源及其翻译原则[J]. 上海科技翻译, 1997, (4): 6-10.
- [22] 李明. 语际翻译的社会符号学理论[D]. 上海外国语大学博士论文, 2004.
- [23] 李锡胤. 关于文学翻译的思考[J]. 中国翻译, 1989, (3): 7-8.
- [24] 刘静. 论小说翻译的符号学途径[J]. 河南社会科学, 2005, (5): 135-136.
- [25] 路景菊. 社会符号学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英语电影片名翻译[J]. 电影文学, 2007, (17): 74-75.
- [26] 罗进德. 略论符号学的翻译观[J]. 中国翻译, 1988, (1): 6-9.
- [27] 罗选民. 互文性翻译研究[D]. 香港岭南大学博士论文, 2006.
- [28] 吕爱军. 社会符号学视角下的少数民族典籍翻译策略[J]. 大连民族学院学报, 2013, (4): 373-376.
- [29] 吕俊. 文学翻译的符号学特征[A]. 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 英汉语比较研究[C].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4. 398-408.
- [30] 秦文华. 翻译研究的互文性视角[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 [31] 隋然. 符号学翻译观与文化翻译学[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4, (S): 35-39.
- [32] 孙瑶. 论语言符号学的翻译单位[J]. 湖北社会科学, 2011, (8): 140-142.
- [33] 王丽娟. 中国符号学翻译研究综述[J]. 重庆与世界, 2013, (7): 60-62.
- [34] 王铭玉. 语言符号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 [35] 王铭玉. 现代语言符号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3.
- [36] 王治江等. 翻译的符号学单位[J]. 河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 (3): 172-185.
- [37] 肖峰. 从哲学看符号[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89.
- [38] 徐岚. 略论符号学的翻译对等观[J]. 四川教育学院学报, 2007, (5): 60-62.
- [39] 尹城. 符号学与翻译学[J]. 中国俄语教学, 2002, (1): 39-43.
- [40] 张亚非. 符号结构 文化差异 语际翻译[J]. 中国翻译, 1988, (1): 16-19.
- [41] 张泽乾. 翻译断想[J]. 语言与翻译, 1988, (1): 14-17/(2): 27-30.
- [42] 郑伟波. 从符号学角度看翻译等值的限度[J]. 中国翻译, 1988, (1): 20-21.